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Neither of the above questions, and none of the other questions which should be asked about other periods in Mao's life, can, in my opinion, be answered in one simple statement, "a" or "b". But we do need to probe into the facts, and to reflec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ll the relevant dimensions, as they relate both to the man who dominated Chinese history for decades, and to the China which made him what he was.

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以及其他也应该提出来的其他问题，都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陈述——a或b——来回答。但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事实，然后思考所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既同这个在几十年中支配了中国历史的大人物有关，也同使这个人成为一个人的中国有关。

Mao Tse-tung 毛泽东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著

Stuart Schram

王应一 唐秀兰 何祚康 杨德 译

萧延中 审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Mao Tse-tung

毛泽东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著

Stuart Schram

王应一 唐秀兰 何祚康 杨德 译

萧延中 审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 (美) 施拉姆著; 王应一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300-19830-9

I. ①毛… II. ①施… ②王…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4316 号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第二辑)

主编 石仲泉 萧延中

毛泽东

[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著

王应一 唐秀兰 何祚康 杨德 译

萧延中 审译

Mao Zedo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9 插页 8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442 000	定 价	98.00 元

总 序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 20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学术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本杰明·I·史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爾 (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 (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杨炳章 (Benjamin 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逢先知、龚育之、冷溶、朱佳木、李忠杰、金冲及、李君如、李捷和陈晋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中文版序

施拉姆教授著《毛泽东》这部政治传记，以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和分析，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我们在编译过程中对这部著作的成就和缺点，对它的可供借鉴之处和不足之处形成了一些初步看法。下面从几个方面简略地谈谈我们的认识和意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

一本具有科学性的政治传记，首先需要对传主有一个科学的评价和认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如何对毛泽东作出客观的和公正的评价，不仅涉及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涉及如何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作者施拉姆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的分析不可能不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但作为一位学者，他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总的方面来说，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比如，作者在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时认为，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离开毛泽东，既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能认识它的现状和未来。

作者还认为，彻底改造旧中国，把中国人民中蕴藏的无穷力量解放出来，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最大贡献。

作者还指出，毛泽东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独特道路，这是他个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作者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基本概括了毛泽东的历史伟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过程中使用过的提法，用以表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施拉姆使用这一概念，侧重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他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是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历史进步力量；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仅是反帝斗争的旗帜，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价值。施拉姆相当重视这种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他以西方习惯的思维方式强调这种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解当然有所不同，但从整体看来，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并充分评价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这还是应予肯定的。

施拉姆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与国内研究者的认识基本接近；他对于“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尽管有些用语较为尖刻，甚至令人感到苦涩，但在总的方面是与我国学者的认识相近的。

施拉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迫切的任务是迅速发展经济，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完成这个任务，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科学的务实精神，进行细致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的。这样一来，战争年代许多成功的经验就不适用了。因此，他不赞成“大跃进”的急躁冒进和“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极端做法，认为这是不适当地照搬指导战争的某些方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应当看到，《毛泽东》一书的作者对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做法和观点虽然有一些偏颇之论，但他公允地指出，不是毛当前的活动，而是毛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及将来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历史地位的决定因素，并且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作了合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预测。一个西方学者早在1967年就能有这种认识，应当说是不容易的。

二

传记作品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中的史实是否准确、资料是否翔实。

我们看到，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比较认真地进行资料收集和考证工作。例如，他为了核实毛泽东抗战时期的一句话，曾多次同埃德加·斯诺书信往来，终于挖掘出斯诺及其夫人当年的一些笔记和文稿。

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苏联、日本和台港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著作和回忆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国的新西北》、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艾伦·惠廷的《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年》、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诺思与尤丁合著的《罗易赴华使命》、诺思的《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鲍罗廷的秘书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的回忆录《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萧祚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以及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的几十部著作。其中许多著作在我们国内尚无正式译本，它们有的提供了具有相当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有的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作者以广泛的资料为基础，才得以对毛泽东前期的一些活动作出比较可靠的分析。

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要准确地反映和分析这个过程，除了参考各种研究著作和回忆录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研究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我们看到，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扎实的工作。他除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外，还参阅了毛泽东在《新青年》、《湘江评论》、《向导》周报、《红色中华》、《中央政治通讯》、《中央军事通讯》、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各解放区出版的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和流传出去的国内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党内的一些讲话。

对于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对于有关著作中的不同说法和观点，作者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进行了比较、鉴别和考证。例如，对于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的某些说法，作者就力求利用各种旁证材料进行分析和批评。据粗略统计，书中对一些观点和史实加以比较和说明的脚注就有三百余条，对于澄清国内外的某些误会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作者在史实考证和文献分析方面不无失误，但总的说来，比较丰富的资料 and 比较严谨的考证，是《毛泽东》一书前半部分的显著特点。

三

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未必正确或完善但却有一定启发的见解。

例如，作者在书中实际上分四个阶段分析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五四运动前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处于探索阶段，表现出强烈的民

族使命感和政治责任心。那时，毛泽东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但尚未树立明确的世界观。可是在这一时期，融中西学为一体的倾向在其思想中已出现。他拥护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青年》杂志，参加了“船山学社”的活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表现。五四运动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发展中是个分水岭，由此开始他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毛泽东从瞩目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者认为，毛泽东此时虽然只能算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初学者，但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给他以极大启发。创建“自修大学”，表明他在继续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作准备。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第三阶段始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作者认为，斯大林指导的错误，促使毛泽东“寻求一条新的、中国式的通向权力之路”。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基本形成，其标志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前后的一系列著作。此后直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都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摸索革命和建设的独立道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第四阶段大致始于1957年后。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极端唯意志论和狭隘经验论的倾向开始露头，这种倾向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放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之以“无产阶级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己长期以来一贯遵循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是否经历了作者所说的这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和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进行更科学的阐述；但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基本线索来分析这一过程，仅这一点也是可取的。

又如，作者认为，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公开冲突的党内矛盾起源于“大跃进”，其实质是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两种不同方针政策之争，也是党的领导层就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大辩论。他不同意国外某些人把个人权力欲和虚荣心看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认为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更深刻的考虑是培养接班人，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新型党组织。这样的分析，应当说，也显露出了作者深邃的见解。

作者认为，虽然不必过多指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实际做法却无助于实现其目标。作者指出，毛泽东号召造反，打碎全部现有的党组织，这在一个共产党已执政的国家中是令人费解的。这不仅使一大批党的重要干部被打倒，而且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的整个政治制

度”。因此，这场运动虽然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但它的实际做法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性主义精神相违背，也否定了毛泽东本人的一贯思想。作者举例说：毛泽东一贯反对个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却使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毛泽东一贯强调团结广大干部，“文化大革命”却怀疑并打倒了一大批所谓的“走资派”；毛泽东过去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文化大革命”却号召红卫兵造各级党组织的反，使之陷于瘫痪。这些分析也与我们的看法相近。

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符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趋势。他预言，中国的科技、管理人员和现代工人不可能无限期地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和做法，某种适合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讲求效率的、合理的政策终将取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改变未必意味着中国将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而重新仿效苏联模式。他还指出，否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不一定就是否定他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这些看法也是很有见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现在看来，作者在书中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许多阐述和分析虽然很不全面、很不深刻，但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十年就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上述一些独到见解，这也表现了作者的客观洞察力。

四

同西方许多传记作者一样，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的个性和品格很感兴趣，他试图揭示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同其性格结构的内在联系。

例如，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为中国革命战争制定高明的战略战术，同他青年时代的个人品格中形成的民族主义、重视“武德”和“好斗”精神不无联系。

不能否认，个人品格因素在历史中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但它毕竟属于历史偶然性范畴，夸大这种因素的作用，往往会造成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

作者虽然对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发表了一些不太正确的见解，但总的说来，在这方面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对这种分析的局限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海外某些学者专从性格结构推演毛泽东政治品质和革命倾向的做法，主张把

分析的重点放到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上去。

施拉姆教授认为，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格局中进行的。正是在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学说，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这本书基本上是在不同层次的各种关系结构中研究毛泽东的。

作者进行分析的第一个层次是中西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宏观结构。他力图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这一总背景下把握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趋势，分析毛泽东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性贡献。这样一来，本书就有了一种较新的观察角度和较为开阔的视野。作者进行分析的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同第三国际，特别是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中国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由于种种原因带来一些消极后果，作者通过这种关系来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活动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作者分析的第三个层次是国共两党的关系。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在各个革命阶段中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构成了毛泽东一生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脱离这种关系就无法正确认识毛泽东各个时期立场和观点的内在逻辑。作者还看到，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的形成、贯彻，往往是通过党内斗争实现的，因此，他也把党内各种不同观点的斗争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层次。

作者的上述分析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努力在各种关系中把握毛泽东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动因和实质，注意比较妥善地处理历史人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从而使本书的分析有一定的历史感和深度。

五

在肯定本书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它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从运用资料上来说，在说明和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方面，缺乏翔实的资料，与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相比，显得单薄得多。有些史实也说明得不够准确，甚至有明显的错误。

史实方面的错误，书中其他部分也有一些，例如对“富田事件”和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活动的叙述，都与事实有出入，但这方面的错误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中。例如，作者根据某些流传出去的并不可靠的消息，认为红卫兵是由军队指导和创建的，彭真早在1966年4月就被捕了，江青在1966年夏已成为中央委员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说法显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作者尚未掌握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加之各种传说纷纭，真伪难辨，这也许是

出现上述失误的客观原因之一。

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充分，或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作者还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或者还存在一些偏见。

这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方面。作者在书中根据欧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在一段时期内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我们知道，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发展，工人群众生活水平确有提高，但从根本上说，这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更没有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未消失，更何况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所揭示的是社会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显然不能根据某些表面的暂时的现象就断言它“过时了”。

我们还看到，作者虽然对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但同时又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这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各个国家进行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中国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有特殊的性质和特殊的规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才可能得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

作者在叙述和分析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方面，也有许多明显的错误观点，甚至有使中国人民不愉快的言论。

例如，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作者一方面看到，它采用的是与“镇反”、“三反五反”不同的说服教育方法，其目的是帮助广大知识分子重新建立“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运动有压抑人性的方面，是以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个人的新孝道填补知识分子头脑中由于摧毁了父权而留下的真空，等等。毫无疑问，思想改造运动存在着缺点，如对知识分子的进步和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对其缺点和消极面看得过重，对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没有加以严格区分，出现过简单粗暴的过火斗争，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等等。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但是，也应当看到，思想改造运动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广大知识分子增强爱国主义和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共同建设新中国等方

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者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批评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有些人所谓的“洗脑”的说法，有较强的片面性。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运动的评述都有这种情况。

又如，作者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时常常把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相提并论，不加区别。这本书是在1967年修订再版的，出现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从“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来看，毛泽东和林、江是有本质区别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是在他错误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确曾一度信任和重用过林彪、江青，而他们也利用毛泽东的失察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革命家所犯的严重错误，而林彪和江青则是妄图利用毛泽东的失误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头子，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帮派体系和准备阴谋叛乱的秘密武装力量。毛泽东对他们进行过批评和斗争。这样一些重要区别是不应当忽略的。分析“文化大革命”，显然不能根据表面现象把毛泽东与林彪、江青混为一谈。

我们还看到，书中的某些不正确的观点还同作者认识问题的方法有关。例如，作者认为，毛泽东晚年表现出的唯意志论倾向早在红军时期就存在了，其根据是毛泽东当时就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主张加强政治教育来改变红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成分的阶级属性。又如，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个人崇拜狂热，其渊源可追溯到延安整风时期。理由是那时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诸如此类的分析，显然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了。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正确的、必要的，不如此，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不可能建立，也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根本不同的。同样，延安时期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与晚年的个人崇拜也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从表面看，这些现象似乎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科学的分析应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从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臆测某些现象的历史渊源。

在生物科学研究中常有这种情况，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被认识之后才能被理解。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也常常如此。但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必须注意事物质的规定性，把不同质的事物区别开来；仅靠表面上的相似性，往往会混淆不同的事物，牵强地把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以作者对个人崇拜的分析为例。个人崇拜是一种有其本质规定的社会现象。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尊敬与个人崇拜是两码事，前者未必一定会发展成后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本人是反对个人崇拜的。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

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吸取斯大林后期犯错误的教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完全科学地解决领袖与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也没有形成一整套相应的制度，但由于毛泽东在那时的作风是民主的，因此他享有崇高威望并没有直接导致个人崇拜。实际上，只是到1957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功，党的一些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同时，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复杂现象，我们党对一些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正确原则才产生了认识上的偏颇。再加上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毛泽东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情况有所发展，进一步助长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直至“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发展到了狂热的地步。因此，根据延安时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来推断个人崇拜起源于此，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既从本民族利益出发，也要兼顾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同民族利己主义者有原则上的不同：作者在分析一些国际问题时，往往淡化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形象，过多地把他描绘成民族主义者。这种情况在书中比较明显，当然是一个较大的误解。

作者在书中还多次提到毛泽东的某些文稿的修改问题，并对此颇多非议。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历来持严谨态度。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他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有不妥当或不完善之处时，总是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修改和补充，力求以最完美的形式把自己的著作奉献给读者。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就是按照这种态度编辑的。选集中的有些地方由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文章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由作者亲自校阅过。从当时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要求来说，主要是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一个基础读物。因此，这样的编辑是有其必要性的。至于对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专业人员来说，仅仅依靠这个选集显然是不够的。不仅毛泽东的许多文稿没有被收入选集，收入的有些文章也与最初发表时的原始形态有所不同。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去做专门的研究了。好在被收入选集或未被收入选集的毛泽东的不少文稿，在党内外的一些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研究人员要找到这些文献不是太困

难。因此，毛泽东修改文稿，从基本方面看，不存在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之类的问题，更谈不上要欺骗舆论、蒙蔽世人等等。当然，那时的编辑工作从技术处理方面说是有点缺点的，再加上后来对毛泽东文献的管理逐渐严格起来，给研究工作也带来了不少不便。应当指出，在“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之后，对《毛泽东选集》的有些原稿或未被收入选集的文献采取的许多不正常做法，是与毛泽东修改文稿、出版选集时的初衷相违背的。毛泽东修改文稿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做具体分析，不能把他严谨的科学态度误作不纯动机加以指责。当然，现在看来，如果在《毛泽东选集》中给那些做过重大修改的文章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并注上原文初次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会使读者和研究者感到方便许多。这是编辑文献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此后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已在这方面有了改进。

以上看法，是我们一些不太成熟的意见，有的可能不正确，欢迎广大读者指正。

《毛泽东》一书写在五十年前。五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文明、民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英勇奋斗着，理论界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石仲泉 张宁 杨德

作者致谢

每一部历史或传记著作，都多少有赖于对书中所述时期某个方面有专门研究的人给予评论或指点，而这部传记，由于其题材的性质，则较我的其他大部分著作，更多地归功于同事们的帮助。自从十五年前出版了诸如布兰特、史华慈、费正清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和史华慈著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等开拓性著作以来，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近年已有几部重要的专著问世，本书已加以充分利用，但还有更大量的著作在撰写或出版中。其中几部书的作者还曾恳切地对本书原稿发表意见，促使我注意研究重要资料，有时还让我看他们的部分手稿。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学者：沃尔特·古尔利和罗易·霍夫海因茨，他们即将在哈佛大学完成专题研究，其专题分别是1921—1927年的国民党和中共1927—1945年的农村政策；唐纳德·L·克莱因正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编纂中共人物辞典，他不仅指出了一些小的错误，而且提供了本书所述毛泽东之外其他大部分人物的简历材料；西德尼·刘（Sidney Liu）是一位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军事史的专家，他对书中论述江西共和国的几段作了详尽的评论；埃兹拉·沃格尔也是一位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军事史专家，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他提出了一些很有益的看法，尤其是关于书中论述1949年以后时期的那一部分。在巴黎的同事克劳德·卡达特和让·谢诺思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提供了一些材料。最后，我极其感激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白余（Yu Beh的译音，下同）教授，他让我自由利用他同毛泽东相处时期的回忆录（自1916—1918年两人在长沙同班学习至1925—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

还应当感谢埃德加·斯诺和出版其无可代替的著作《西行漫记》的维克多·戈兰茨公司，他们同意我引用其中一些简短的引文。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先生讲述的本人经历，仍然是他迄至当时的基本生平史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同意我转引尤丁和诺思所著《苏维埃俄国和远东》一书中一段引文，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同意我引用博伊德·康普顿所编《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一段文字，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应当在此说明，我大大得益于陈志让的著作《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这本书是第一部严肃的、有文件根据的毛泽东传。我在相当多的史实与观点上不同意陈先生（有几处例外，我觉得加以指出是多余的，对这

个问题有研究的读者不难看出)。但是，毋庸置疑，如果我不能将我们两人的观点作一对比研究，并利用他在几个方面所广泛掌握的毛泽东生平背景材料，则现在这本书更会失之于专题性研究的不足。

关于引证毛泽东著作时所选用的版本，有两个问题也许应当作一说明。首先，如我在此书中所不时指出的，目前官方版本的原著，改写之处甚多，很不可靠，不能从中了解毛泽东一生各时期实在写的或他实在想的东西。有鉴于此，当需要注意某段文字的确切措辞或含义上的细微差别而该文又被收入我所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时，我就引用那本书上的译文，那上面的译文我尽量依据中国现行的文本。其次，有许多文章没被收入上述文集，我就用北京出版的英译本（四卷本，外文出版社1960—1965年版），而不用劳伦斯-威沙特公司和国际出版公司早先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的五卷本。后一种版本现在受到中国人的非议，所以看来最好是引用经认可的译本。本书在打清样阶段，北京版英译本才问世，似无必要将书中的伦敦版译文均换为北京版译文而给出版商增加困难。因此我只在注释中将引文出处改动了一下，想查北京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读者，会发现引文同书中译文不完全一致，但不难查出引文出处。

去年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诗词的译文：陈志让在前已提到的他所著毛泽东传中翻译了现已发表的全部三十七首；波尔·德米热维尔翻译并分析了其中十首（《法国信使》，1965年4月号）；C.N. 泰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雪〉到〈咏梅〉》的文章（《亚洲研究杂志》，1966年2月号）；1964年1月官方发表了十首诗词的译文（《中国文学》，1966年5月号）。这促使我对我以前自译或改译的某些诗词又加以推敲，并作了一些修改。这方面，巴黎的唐纳德·霍兹曼教授曾以其渊博的汉语和中国文学知识惠予指教，在此也表示感谢。

由于得到了上述学者的热情帮助，或利用了他们已出版的著作，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做到大体上准确无误。我力求不带偏见，如果不无主观见解的话。书中无疑还会有错误，有些观点和说法可能缺乏说服力，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1966年